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五零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9年6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时1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豪尔赫·瓦莱罗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GE.19-10705 (C) 101219 270220



请回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503 次全体会议开始。各位阁下、尊敬的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向今天出席本次会议的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米凯尔·默勒先生表示热烈欢迎。

如前所述,今天上午我们将举行关于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1、2 和 4 的专题会议。尊贵的专题嘉宾是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及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参赞乌斯曼·贾杜恩先生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他战略武器方案负责人约翰·博里先生。他们将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核裁军主题发言。

我建议在他们发言结束后,今天实质性讨论的其余部分将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因此在两位嘉宾的专题发言之后,我打算暂停正式全体会议,并继之以非正式讨论。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我将结束非正式会议,并重新召开正式全体会议。

尊敬的外交官们、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欢迎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及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参赞。尊敬的代表,请你发言。

贾杜恩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将就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 1、2 和 4 有关的问题简要谈一些看法。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1 和涉及消极的安全保证的项目 4 被列入 1979 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一届会议的议程。自 1984 年以来,我们审议的第三个项目“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相关事项”也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议程项目。

在这些项目列入裁军谈判会议议程的 40 年里,提出了许多关于消除世界核武器的想法和建议。一些人倾向于“循序渐进”的方式,也被称为“渐进”或“积木”模式。据我所知,一种以“踏脚石”形式出现的新的混合模式也即将问世。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按照《化学武器公约》的思路采取全面的做法,即在有时限的方式下禁止核武器并彻底消除核武器。还有一些人对被认为缺乏进展感到沮丧并对人道主义后果表示关切,他们已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编纂了一项禁止核武器的条约,而拥有这些武器或依赖这些武器保障其安全的国家却并没有参与。过去还曾提出了一项框架公约,其中包括一项起首协定,该协定确立了关键的禁令,并规定随后就拟订消除措施的议定书进行谈判。

联合国大会的概念方法、条约草案案文、工作文件、宣言和决议,以及世界领导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忠告,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提供了不同的途径。这方面我们并不缺乏。在我看来,我们缺少的是允许在这些不同途径上取得进展的安全条件。在不信任日益增长的环境中,大国竞争正在重新出现,新技术,从网络空间到外层空间,从人工智能到特超音速运载系统,正在塑造着人们对威胁的认知。少数国家坚持努力在区域和全球两级确立其霸权和支配地位,使得核裁军似乎一如既往地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坐等,让事情自行改正或者变得更糟,都不是办法。战略环境不是不作为的借口,而应成为重新作出外交努力的呼吁。我们有责任解决那些能够扭转下滑趋势的潜在因素。让我从我们的角度提供一些处方。

第一，承认所有国家享有平等安全的权利。必须避免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合作性多边主义和公平的世界秩序。

第二，解决驱使各国获取核武器的根本原因和动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关切。

第三，表达对普遍核裁军的新承诺，承认军事能力较强的国家在能够保证无核武器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振旗鼓的集体安全体系框架内发挥带头作用的特殊责任。

第四，根据各国各自的国际义务，为在适当保障措施下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制定一种基于标准的非歧视性办法。

第五，在核裁军之前，通过在裁军谈判会议缔结一项普遍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障。

第六，加强防止外空武器化的法律制度，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这方面的谈判。

第七，作为实现核裁军的一个具体步骤，通过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缔结一项非歧视性裂变材料条约，处理过去和未来的裂变材料生产问题。

第八，将网络武器、自主武器和其他新型武器系统置于适当的国际管制、条例和禁令之下。

第九，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对话和外交，解决区域安全问题，包括在南亚建立战略约束机制；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

最后，寻求相互和平衡地裁减常规武装力量和军备，承认它们与继续依赖核武器的直接因果关系。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论坛说几句话。本会议厅中的许多代表要么哀叹缺乏政治意愿，要么将目前的事态归咎于裁军谈判会议的机构及其工作方法。这些只是困扰国际裁军格局的忧郁不振的症状。裁军谈判会议不是存在于真空中，不可能不受其运作所处的战略环境的影响。它过去在缔结真正公平和符合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条约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功。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资格包括所有相关利益攸方和军事大国，及其议事规则，使每一成员国能够维护其重大利益，这是缔结裁军条约的基本先决条件。维护这一独特机构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潜力，也是我们的集体责任。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感谢乌斯曼·贾杜恩先生有意义的讲话和思考。现在请裁研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其他战略武器方案负责人兼裁研所研究协调员约翰·博里先生发言。

请约翰·博里先生发言。

博里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也感谢裁军事务厅和裁谈会秘书长米凯尔·默勒先生。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但我认为公平地说，他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带领我们走过了某种黄金时代。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让裁军谈判会议恢复工作，但他已经是一位受欢迎和富有成效的领导人。我谨代表我本人和我在裁研所的同事们感谢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工作，并祝他未来一切顺利。

我的同事乌斯曼·贾杜恩是一个非常难以效仿的人，但我要向他保证，裁研所正在开展与核裁军、核风险以及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其他方面有关的几项工作。但我今天想谈的实际上是一些不同的东西：最近的一篇文章谈到扭转今天滑向大国竞争和军备控制努力崩溃的问题。前一位发言者已经使用了“扭转下滑”这一术语，它也出现在我所指的论文的标题中。其背景是，今年1月底，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七十一届会议。在审议过程中，委员会重点关注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制度在管理战略竞争和建立信任方面的作用。应委员会主席的邀请，委员会成员之一，前美国大使刘易斯·邓恩为这些审议工作提供投入，并提出想法供可能的审议。邓恩先生曾担任198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的美国大使，并曾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助理署长。

他的工作成果是一篇我们裁研所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论文。我们请邓恩先生详述论文内的构思，并于最近向更广泛的读者发表这些构思。我今天征得邓恩先生的允许，将谈论的就是这份扩展形式的论文。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扭转下滑：大国竞争加剧和军备控制努力崩溃”。在这个房间里提供了一些副本，该论文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www.unidir.org 下载。为何要在这里谈论这样一篇论文？邓恩先生认为，大国竞争的加剧以及美国、前苏联和俄罗斯50多年军备控制的崩溃，这一下滑早已经开始。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建立一个更非正式的美国—中国战略可预见性、保证和克制的进程的努力正在结束。我要指出，邓恩先生的判断与联合国秘书长2018年5月报告“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中的判断非常接近。

有很多理由可以判断，这种持续下滑将破坏而不是促进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安全利益。这也不符合他们的盟友、朋友和相关国家的利益。这更不利于一项强有力的不扩散条约或更广泛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撰写该论文时，邓恩先生认为，必须列出尽可能多的不同但可能相辅相成的途径以走出当今的形势。在讨论扭转下滑趋势的方法时，作者充分认识到美俄将军备控制作为调节战略关系的手段的漫长历史与中美之间较新的对话、保证和克制努力之间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论文中提到整个军备控制努力的原因。

论文没有论及我们如何得出这一点，但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等机构正在非常深入、非常详细和非常持久地讨论这个问题。相反，他的论文把找到尽可能多的摆脱这种局面的方法视为关键挑战，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面临的利害关系上。他认为，有确实的理由相信，如果这种下滑不能被逆转，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情况都会变得更糟。我不打算详细回顾每一条这样的途径，因为有相当多的途径，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但我将用“途径篮”的术语简洁地框定这些途径，实际上，即谁该做什么。

第一个“篮子”涉及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个主角自己的行动。出发点是，他们需要各自后退一步，问一问，大国竞争加剧和军备控制努力的结束，是否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外人可以鼓励他们这样做，但这是他们需要自己去做的事情。仍然在这个“篮子”中，假设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确实决定下滑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需要找到方法，以表明他们承认这一判断，并致力于不同的事业。关于主角的行动，邓恩先生建议建立高级双边军备控制咨询委员会，其中涉及美国和俄罗斯的咨询委员会与涉及美国和中国的咨询委员会的目标和任务是各不相同的。他在论文中详细说明了这些任务。他还指出，国防接触和军方对军方接触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美国和中国似乎比美国和俄罗斯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在他看来，另一条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对华盛顿和莫斯科来说，将是重申和更新由来已久的冷战危机——冲突避免/管理机制。防止核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谈判了几项避免危机冲突的协定。第一，是 1971 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通常称为《事故措施协定》。这使两国都承诺采取措施，“防止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

第二，是 1972 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防止公海和公海上空事件的协定》，其中规定了“确保各自武装部队的船只在公海上航行和军用飞机在公海上空飞行的安全”的措施。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1973 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承诺两国“消除核战争危险”，并“防止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危险恶化的局势的发展，[以这种方式]避免军事对抗并……排除他们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邓恩先生认为，美国和中国也有机会加强新措施。他指出，双方签署了 2017 年军方对军方协议，旨在改善交流以减少误判风险，以及早就就重大军事活动进行通报的建立信任的双边框架。最近，美国和中国承诺发展一个军方对军方的危机沟通和消除冲突的框架。所以这里是有基础的。最后，在第一个“篮子”中，邓恩先生强调需要再次尝试使用外交手段来缓解或解决潜在的政治紧张、恐惧、野心和利益冲突。

第二个“篮子”包含的路径不仅包括几个主角，还包括其他国家。在这个“篮子”里，前进的道路之一是利用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与的所谓“五常”进程。特别是，在关于核理论的日益有力的对话基础上，可以寻求利用这种对话帮助减少相互误解和避免错误的机会。减少核风险也是一个有希望的领域，我鼓励任何有兴趣的人看看裁研所在这一领域最近和即将出版的刊物。但更广泛地说，过去十年里各种专家提出的探索核或战略的行为准则的想法可以继续下去。最近，美国在本会议厅和其他地方提出为核裁军创造条件或创造环境，即“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简称 CEND。邓恩先生指出，对这一想法的反应褒贬不一，但他表示，CEND 可能是一个讨论和确定缓解大国竞争的措施的机会，这显然是裁军的一个条件。

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篮子”。当然，现在并非本机构的所有成员都是《不扩散条约》的成员，但他提出，该《条约》在确定大国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的透明度以及大国对寻求此类措施的承诺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用处。

因此，这些就是邓恩先生概述的主要措施，但他确实还有最后的“篮子”措施，在这些措施中，他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可以采取的某些行动。其中一项建议是秘书长考虑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这可使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但邓恩先生也指出，援引第九十九条的情况极为罕见，历史上他只能找到三个例子。秘书长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邓恩先生指出了这些措施，但没有在论文中加以探讨。这些措施旨在鼓励重新思考和寻找更好的前进道路。

一种办法是秘书长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将专家组聚集在一起，以确定大国信任和建立信任的措施。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秘书长可以召集退休官员、军队成员和专家以及三位主角，就如何保持或转变美俄双边军备控制，以及如何推进美中相互战略保证和克制进程，分别进行高级评估。当然，秘书长可以，而且我相信他确实会这样做，非正式地利用他的斡旋，鼓励所有三位主角的领导人思考继续滑向大国竞争和军备控制努力的崩溃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若不符合，那么即使不能立即扭转下滑的话，至少应开始寻找减缓下滑的方法。

这就是邓恩先生的论文及其观点的简要概述。我鼓励大家阅读和讨论。虽然他今天不能亲自在这里介绍这篇论文，但我指出他论文结尾的一句话：“在这份参考论文中勾勒出了不同的可能途径。所有这些途径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一些无疑会证明对三位主角来说比对别人更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开始谈论今天的下滑，然后采取行动扭转它。成功反过来又将重新打开其他可能性，以重振追求核裁军长期愿景的努力。这种成功，这种打开其他可能性的做法，显然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前景有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博里先生，非常感谢你有意义的介绍和思考。各位阁下、尊敬的代表们，我现在暂停会议几分钟，以便开始非正式会议，同时会议事务处要处理几个技术问题。

会议休会。

上午 10 时 35 分散会。